

当代中国民主的条件分析

陈炳辉

[摘要] 本文对当代中国民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了初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当代中国民主有利的经济条件;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政治文明观念的扩展,是当代中国民主有利的文化条件;执政党追求民主政治的坚定意志,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是当代中国民主有利的政治条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够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域广、人口多、地区差异大,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良好的法治环境尚未形成,缺乏支撑民主的公民社会,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这些则是当代中国民主的不利条件。

[关键词] 当代中国民主 市场经济体制 公民民主意识

20世纪以来,民主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是并非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可以不顾一切条件而实行民主制度,在20世纪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中,有的国家民主化成功了,而有的国家民主化却失败了。亨廷顿的分析表明,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却又有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不少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因此导致了威权制度的回潮。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要有一定基础的,民主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成功与否是与一定的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密切相关的。本文将对当代中国民主的条件作初步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当代中国民主有利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和政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民主制度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不可能

离开一定的经济条件而完全独立存在。相反,民主制度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受一定的经济条件制约的。当代西方的许多政治理论家,如李普塞特、达尔、亨廷顿、科恩、萨托利等在讨论民主问题时都注意到民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把经济因素作为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条件。对当代中国民主的条件分析,首先必须分析的是当代中国民主的经济条件,这里将从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考察当代中国民主的经济条件的问题。

1. 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一般说来,民主制度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民主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解决好民主问题,从经济体制上分析,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换句话说,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集权化、官僚化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抛弃了市场经济,由国家经济实行全面的计划和控制,以国家计划代替市场,以政治原则代替经济的运行机制,它所

带来的是国家及其官僚对经济的严密控制和支配。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化、官僚化的政治体制正是由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其实,除前苏联外的其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产生了类似苏联的集权化、官僚化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一切经济行为由国家(官僚)来计划、安排,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否则它很难正常运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指出:“在一个非市场化的经济中,无论正式的、合法的企业所有权是怎样的,它们的决策实际上都是由政府做出和控制的,没有了市场的协调功能,政府就必定会担当起分配所有稀缺资源的任务,这些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机器、土地、建筑物、消费品、住房及其他的东​​西。”非市场的计划经济,需要由政府制订详尽的计划,由政府的官员负责计划的实施,这样社会的整个经济发展就受控于政府及其官员,必然导致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政府具有过大的甚至是绝对的权力。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只能是民主的政治体制,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达尔认为有利于民主的关键条件有五条,市场经济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就像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却牢不可破,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用植物世界来做比喻就是,二者是敌对的共生。”亨廷顿也把市场经济视为民主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是有助于民主的重要变项。从历史和现实看,民主制度只是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存在,而很难在非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成功地实行。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为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要求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人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互补性、互动性完善了我国经济所有制的结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也已基本形成,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及土地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形成了以市场价格为主的调节机制,目前95.3%的商品和服务已由市场定价,中央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已从1992年的141种减到13种。

已经初步建立并且将逐步完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当代中国民主奠定了基础,是当代中国民主的有利条件。首先,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必然会要求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充分地体现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集权的政治是同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不相容的,蕴含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必然要影响到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成为民主政治的动力。其次,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一个复杂多样的经济体系,而这是集权的政治体制所难以驾驭的,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复杂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复杂体系中,决策权是高度分散的,是由无数自由、平等的独立主体参与竞争的,竞争者是自利的并受市场提供的信息所引导,不需要集权的中央政府来计划、安排企业及个人的行为,集权的政府也无法支配、控制这种复杂多样的经济体系,只有民主体制才能与其相适应。所以一般说来,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快,政治民主化的压力就越大,市场化的程度越高,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民主化的实现。市场经济中形成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带来利益

的多元化,造就不同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产生不同的要求和声音,这种社会结构比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结构要更为复杂,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只有通过民主体制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2.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现代西方政治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分析了民主的经济条件,通过研究分析,李普塞特发现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的平均值要高于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他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也得出与李普塞特相近的结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主的实现。亨廷顿的研究分析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多数的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是富裕国家。这表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存在相关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9年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的24个高收入国家中,有20个是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的42个低收入的国家中除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外基本上是非民主国家。为此,亨廷顿也认为:“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

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的话,那么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为当代中国民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全球的第四大经济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东方大国的经济崛起。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182321亿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计算折合为222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985元(1703美元),虽然中国

的人均GDP水平依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但是GDP总量已从2004年的世界第六位跃居为第四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财富积累的增加,民主的条件就越充分,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把民主政治看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的。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能够提供民主的有利条件、促进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社会的生活水平,有助于塑造公民的价值和态度,造就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使民主得以维持和运作。科恩指出:“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合理水平的经济福利”,“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民主是一种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社会财富增长了,人民丰衣足食,才能使他们成为关心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才会有成功的民主。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使社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得到增长,能够满足民主政治对资源的需求。民主政治需要妥协、宽容,互惠合作。“当经济冲突出现的时候,经济增长可为互惠的解决方案提供资源,以使各方有所妥协(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冲突成为一场零和博弈:即我受益则你受损,你受益则我受损。这样,合作是不可能的)。”经济发展为社会增加了更多的资源,提供了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使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能够在妥协、互惠的民主方式中得以解决,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运作。第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消除极度的贫困,导致平等的收入和分配,降低财富的不平等,这是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的。虽然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甚至加剧贫富的两极分化,但是,从长远看经济发展有助于平等的实现。经济发展既能推进财富的增长,又能推进财富的相对平等,消除极度的贫困,这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了“人均财富的低水

平与足以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的不满情绪的积累之间的相关性”。当财富增加,收入趋向平等时,极端主义的观念和社会的剧烈冲突就会减少,民主的运作方式就能更好地生存。相反,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大多数人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就容易滋生激进的、极端的政治观念,可能导致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民主制度就难以适应,只好依靠威权甚至是专制的政权来维持社会的稳定。第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而中产阶级通常是民主政治的有力支撑。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考察古代城邦制度时,就注意到中产阶级与共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方案就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民主)政体。“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为民主的政体。”亨廷顿在考察第三波的民主化运动时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中产阶级”。^⑩韩国、菲律宾、西班牙、巴西、秘鲁等国的民主化中,中产阶级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造就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并且还将继续扩大。按照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是要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那时中产阶级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民主的运作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一般已经实现了民主,而经济最不发达的贫穷国家民主化还很难发生。“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化过渡。”^⑪处于中间状态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往往是向民主体制过渡的转型带国家。亨廷顿的研究表明,这种转型带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GDP为300—500美元,70年代为600—1000美元,90年代为1000—3000美元。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1703美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的转换,人的观念的变化,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增大了,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只能因势利导,为当代中国民主创造更为坚实的条件。

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政治文明观念的扩展是当代中国民主有利的文化条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当代中国民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经济并不是决定民主的唯一因素,文化也是影响民主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的许多政治学家都非常重视民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政治文化大师阿尔蒙德认为:“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能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⑫国内政治学者燕继荣形象地将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是硬件,而政治文化是软件,二者必须相互兼容、相互匹配。^⑬一定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制度的软件,是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条件。应当说,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中缺乏认同、支持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却发生了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变化。

1. 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美国学者达尔不仅把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视为有利于民主的条件,而且更是将“民主的信息和政治文化”视为民主的关键条件。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提出,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必须具备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才是可行的,才能使民主的政治机器正常地运作,而其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人民必须愿意接受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有的民族并不喜欢民主共和制,那就不能强加给他们,否则就会出现无法克服的障碍。^⑭而黑格尔则早就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否则国家制度只能在外部分存在着,而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⑮他以拿破仑在西班牙强行推行的理想制度为例,说明一个没有被人民所接受的制度的推行只会把事情弄得更

糟。因为某种制度的存在和运作是以人民对该种制度的认同支持为前提条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种凭主观想像而制造出来的好制度,民主制度需要某个国家人民的民主意识,需要某个国家的人民愿意接受民主的制度。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实行的是君主制,而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民主的因素。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民本思想,强调“民惟邦本”,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民主的思想火花,如平等的思想、天下为公的思想,但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的意识。19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传入我国,林则徐、魏源最早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都从思想上否定君主专制,宣传了西方的民主思想。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新文化运动使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1年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解放以后,我国逐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虽然其间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导致了破坏民主、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上走了一些弯路,但是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正在逐步增强,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的增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民主已经成为全人类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方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必然会更多地影响到中国,虽然西方民主有其局限性、虚伪性等消极因素,但也包含有政治文明的积极因素。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开放的中国不能不受到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的影响,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在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得到促进。

事实上,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的增强,更多地源自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一再重申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并且逐步推动了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的民主信念作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发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推进了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增强。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的增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公民的民主意识的增强,一般说来,受过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更多地具有民主的价值观。

2. 政治文明观念的扩展。民主制度的实行,需要公民对民主的认同、支持和热爱,需要公民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但是,民主制度的实行又不仅仅只是需要公民的民主意识,而且需要一种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氛围,需要公民具有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明观念。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增强了,而且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文明观念也在逐步地得到扩展,一种适应民主的政治文化正在逐步的建构中,这些也是当代中国民主的有利条件。

本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民主理论家布莱斯认为,代议制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有良好的传统,存在着一种有利于民主的社会氛围,如酷爱自由、尊重法律、崇尚宽容等等,也就是说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文明程度,民主才是可行的。在社会缺乏政治文明的氛围下,民主是很难生存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真正开始了向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的转换,虽然我们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成这样的转换,但是政治文明观念毕竟正在逐渐地扩展。

政治文明观念包括了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宽容等诸多政治理念,如果所有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理念,具有这种信仰、价值取向和情感,那么我们的社会肯定就是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观念的扩展,当然也表现为这些政治理念正在为国

人所接受,这里主要将从人权观念的角度说明政治文明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扩展。80年代初期,人权问题在我国还被视为禁区,人权观念还被视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被视为西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如今人权问题已经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人权观念已经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我国政府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了人权是国家的目标,保障人权、维护人权是各级政府机关的主要职责。与此同时,我国公民中的人权观念也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懂得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权利,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除了人权观念外,中国公民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等政治文明观念,也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逐步地扩展。

三、执政党追求民主政治的坚定意志、 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是当代 中国民主有利的政治条件

当代中国已经具有了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但是正像亨廷顿所说:“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 and 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⑩这些因素只是使民主的实现成为可能。要使民主成为现实,需要把有利于民主的客观条件化作人们的政治行动,需要这个国家的政党、领袖、精英和公众的行动,需要这个国家的人民努力去造就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政治的意志日趋坚定,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民主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1. 执政党追求民主的坚定意志。人们不可能在民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客观条件不存在的地方,完全依靠主观的意志和美好理想去制造民主,但是,在具备了民主的某些有利的客观条件下,倘若没有政党、政治领袖、社会精英和大众的

行动,民主也不会自然实现。现代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如果缺乏一个以民主为目标的政党,如果执政党缺少民主的意志,那么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民主信念的政党的存在是一个现代国家民主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坚定意志,这是当代中国民主的根本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更加坚定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信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把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作为我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中,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等六个方面,民主法治被置于和谐社会构想中的第一目标,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政治的坚定意志。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追求民主政治为目标。在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政治的要求更加迫切。首先,民主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民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模式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是背离民主和法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次,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的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包括政治的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国家的现代化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民主。第三,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无法在经济领域内解决,而需要在民主的政治体制内来解决。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提供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是中国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追求民主政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意志。

2. 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虽然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原则,并且确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缺陷。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来自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又受到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它是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是同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此,改革开放后,也开始了以执政党为主导、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主要体现为民主制度的完善、党内民主的改善和基层民主的扩大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民主制度的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民主化为导向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坚持和完善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政体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二是加强了法制建设,推进了依法治国的进程,改善了传统政治体制中法制不健全的局限;三是完善了民主监督制度,建立起多层次的民主监督体制,将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四是推进了政府的机构改革,努力纠正了政

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官僚主义问题,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着手建立高效规范的政府管理体系;五是逐步建立起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将保障人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之一。

其次是党内民主的改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当代中国的民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⑧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共产党,对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党内民主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也包括了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党内民主得到了坚持和改善。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制度、民主决策制度、党员权利制度、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等,在改革中得以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在部分基层单位进行试点,乡镇党委书记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是党内民主的重大突破,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

第三是基层民主的扩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城乡基层民主的不断扩大,已经建立起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使广大农民能在本乡本土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农村的村民自治中,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民主决定本村的公共事务,用民主的方法调解农村的矛盾和纠纷,维持村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的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被称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改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当代中国民主面临的不利条件

上文分别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角度分析

了当代中国民主的六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但是,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也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客观地分析这些不利条件,努力消除不利于民主的障碍,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模式。

1. 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现代民主是与市场经济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构和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还不够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不够成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体制并没有完全改变,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完全形成,市场体系不够有序,市场秩序不够规范,政府的过度干预依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又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水平。虽然我国的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的第四位,但是人均GDP水平依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的竞争力不强,等等。尤其是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非常突出,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比较低。正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具有正相关性,经济水平不高会成为民主进程的障碍。虽然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能够长期维持民主制度,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贫穷基础上的印度民主总存在着一些惊人的缺陷,违反基本人权的事件频频发生,政治生活中充满了骚乱、暴力,甚至被列入世界上10个最腐败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加快改革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为当代中国民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正如亨廷顿所说:“如果你想造成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⑩

2. 地域广、人口多、地区差异大。历史上的

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因为最早的民主带有更多的直接民主的色彩,是由全体公民参加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城邦的公共事务。因此它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中实行。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卢梭等西方政治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观念,君主制适于大国、贵族制适于中等国家,民主制只能适于小国。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民主政治通过代议制的形式,克服了直接民主制的缺陷,找到了在大国实行民主制的办法,民主制才能在大国得以实行。虽然代议制使得民主在大国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大国的地域广、人口多、地区差异大,因此其民主的运作比在小国中难度更大。民主是需要共识的,但是随着地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各种差异的增大,形成共识就会愈加困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56个民族,目前各地的发展程度、生活水平、风俗习惯的差异甚大。这就增加了当代中国民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3. 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性的传统。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也包含了某些有利于民主的因素,特别是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但是它并没有发展成为人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在一个自古只有君主统治的封建社会中,是难以形成一种具有民主性取向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等级观念、特权观念、顺从观念、人治观念是与民主思想相悖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这种传统中人们的理想就是有能以民为本的明君清官,而缺乏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缺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观念。

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随着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公民民主意识逐渐增强,政治文明观念逐步扩展,政治文化上出现了有利于民主的因素。但是就总体而言,民主的观念还只是处于表层意识,政治文化还只是在表面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深层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当代中国,民主还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一种普遍的生活

方式、一种普遍的民情,人们把安定的秩序、富足的生活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更为重要把廉洁高效的政府看得比自由民主的政府。当代中国民主的进程不能不受中国的民情、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

4. 良好的法治环境尚未形成。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离的,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民主政治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方面,民主是法律的基础,离开了民主前提的法律,就可能是恶法,没有民主的前提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另一方面,民主也离不开法律,民主在一定的法律秩序下才能正常地运作,离开了法律的约束,民主就可能成为“多数的暴政”,就可能导致无政府的状态,就可能酿成“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中国长期的封建王朝中缺乏法治的传统,传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人治社会。中国早期的启蒙学者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的按语中尖锐地指出,在君权制的中国王朝,有法无法可以全凭君主的高兴,可以任意用法易法,所以即使有法也是专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形成法治的传统。^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针,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的建立和完善,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了加强,司法改革正在积极地推进,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有了增强。但是,由于长期缺乏法治的传统,当代中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并没有真正形成,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人治现象还普遍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在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的条件下,民主的运作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法律框架的限制,民主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动乱,甚至造成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为了民主,我们必须努力去建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5. 缺乏支撑民主的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的,许多西方学者都把公民社会的存在视为民主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古希

腊的雅典城邦民主制也是依靠城邦的公民社会的支撑才得以存在和运作,而当代的民主能够成功运作一般是在发达国家,这除了发达国家的优越的经济环境,好的公民社会也是其重要的基础,相反,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其民主运作也往往因为缺乏一个健康良好的公民社会而不成功。比如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国家的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运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缺乏一个健康良好的公民社会,一般平民为了生存而依附于精英,依附于权力关系,丧失公民的独立自主性,对政治家族的效忠超过对国家的忠诚,政治生活私人化、家族化,各种利益集团运用金钱权力的优势在民主政治中得势,使民主政治变为了金钱政治、家族政治、威权政治。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健康的公民社会是成功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状况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但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公民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解,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依此看来,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并未真正形成,公民文化、公民道德普遍缺乏,为此,林毓生先生特别指出,在建构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根基时要努力挖掘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资源,关注公民社会的建设,关注公民文化、公民道德的建设。如果没有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人们为了私利而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建立起民主制度,也可能是类似于东南亚国家那样的不成功的民主政治。

6. 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根据实际的国情,当代中国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只能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这是现实的选择。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还需要不断地

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尚未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总结概括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某些根本特征,但是却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设想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的政治形式。列宁在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但是因其过早逝世而无法很好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以致后来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式的苏联政治模式。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是他同样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方式,他的“大民主”的理想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了积极的思考,提出了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并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继续了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但是,客观地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至今还不够成熟,还处于摸索探讨的过程中。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可以照搬,尽管共运史上有过巴黎公社、苏维埃的民主实践,以后又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集权化、官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要解决好经济问题,通过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解决好政治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营造高度的政治文明。相比较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比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更大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注释: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177页。

同上书,第174页。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5页。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68页。

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0—111页。

达尔:《论民主》,第176页。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36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6页。

⑪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77页。

⑫同上书,第70页。

⑬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

⑭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⑮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8页。

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2页。

⑰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120页。

⑱《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⑲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序4。

⑳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6页。

(作者: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周凡)